

生命之泉为何是欧洲历史的泪痕

·导读：1935年，纳粹德国第13届纽伦堡党代会召开通过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标志着纳粹种族主义思潮进入疯狂阶段。“生命之泉”——纳粹狂热种族计划的一环，藉此秘密启动。它试图“批量生产”雅利安纯种婴儿，以实现种族纯化与繁育未来纳粹精英目标，最终确立雅利安人对世界的统治。这些“雅利安”孩子以“超人”和“世界未来统治者”名义降生于世，但在纳粹覆灭后，被生母抛弃，被历史遗弃，饱受着半个多世纪无根的孤独与“纳粹血统”负罪感的折磨。他们被呼作“恶魔之子”，即恶魔希特勒的孩子，但他们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恶魔希特勒的孩子，而是纳粹种族狂热计划下的悲剧产物。他们既因希特勒被从地狱带到世间，也因希特勒被带至地狱……

（全文共计11113字，预计阅读需要20~25分钟，内容较长，建议收藏后阅读）

拉莫拉耶，让世界震惊

1944年6月初的一个早晨，即巴黎解放之战前夕。索尼娅·佩洛特，一个世代居住在法国巴黎北部拉莫拉耶地区的村民，像往常一样沿着途经拉莫拉耶庄园的路去照看他的农田。没多久，他走到了拉莫拉耶庄园门口。他惊奇地发现，往常紧锁的庄园大门却掩开了一条缝隙——在他印象中它的大门从未打开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不知情地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

院中没有人，缠满常青藤的大树在昏暗中显得诡异。他悄悄地来到一扇窗户旁向里观望。没有人发现他。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场景可能这一辈子也无法忘记：整个屋子里密密麻麻地塞放着初生的婴儿，一群表情麻木的护士在她们间来回穿梭，仿佛她们面对的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只有那些露出的稚嫩可爱的小脸才证明她们怀中的是一个个幼稚的生命。佩洛特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和恐惧：“这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这些孩子从何而来，他们究竟是些小天使还是‘恶魔之子’？”



图为护士们在“悉心照料”婴儿

消息很快传遍村子，村民们开始纷纷议论。但在纳粹严格的言论控制下，真相依旧扑朔迷离。直到1945年1月初一群美国士兵闯入了那座庄园，他们在庄园中发现了许多散落在地的婴儿的出生护理记录。但不明真相的人们还认为那是一个产科医院。

但是，随后官方公布资料却让包括拉莫拉耶村民在内的全欧洲人都大吸一口冷气！这座庄园，根本不是什么产科医院，而是一座专门用来繁育纯种雅利安婴儿的“生育农场”。这种生育农场在后来揭秘的纳粹官方档案中，有着一个美丽却诡异的名字——生命之泉花园。

拉莫拉耶，让世界震惊，整个世界都对纳粹这一反人类的罪恶行径为之愤怒。但事实上，更为震惊的是，这个计划从十年之前就已开始实施，且法国拉莫拉耶庄园只不过是第一处被发现的生命之泉家园……

生命之泉计划诞生始末

生命之泉计划，这一反人类的种族计划，出自深得希特勒信任，权力一度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首脑、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之手。



图为盖世太保海因里希·希姆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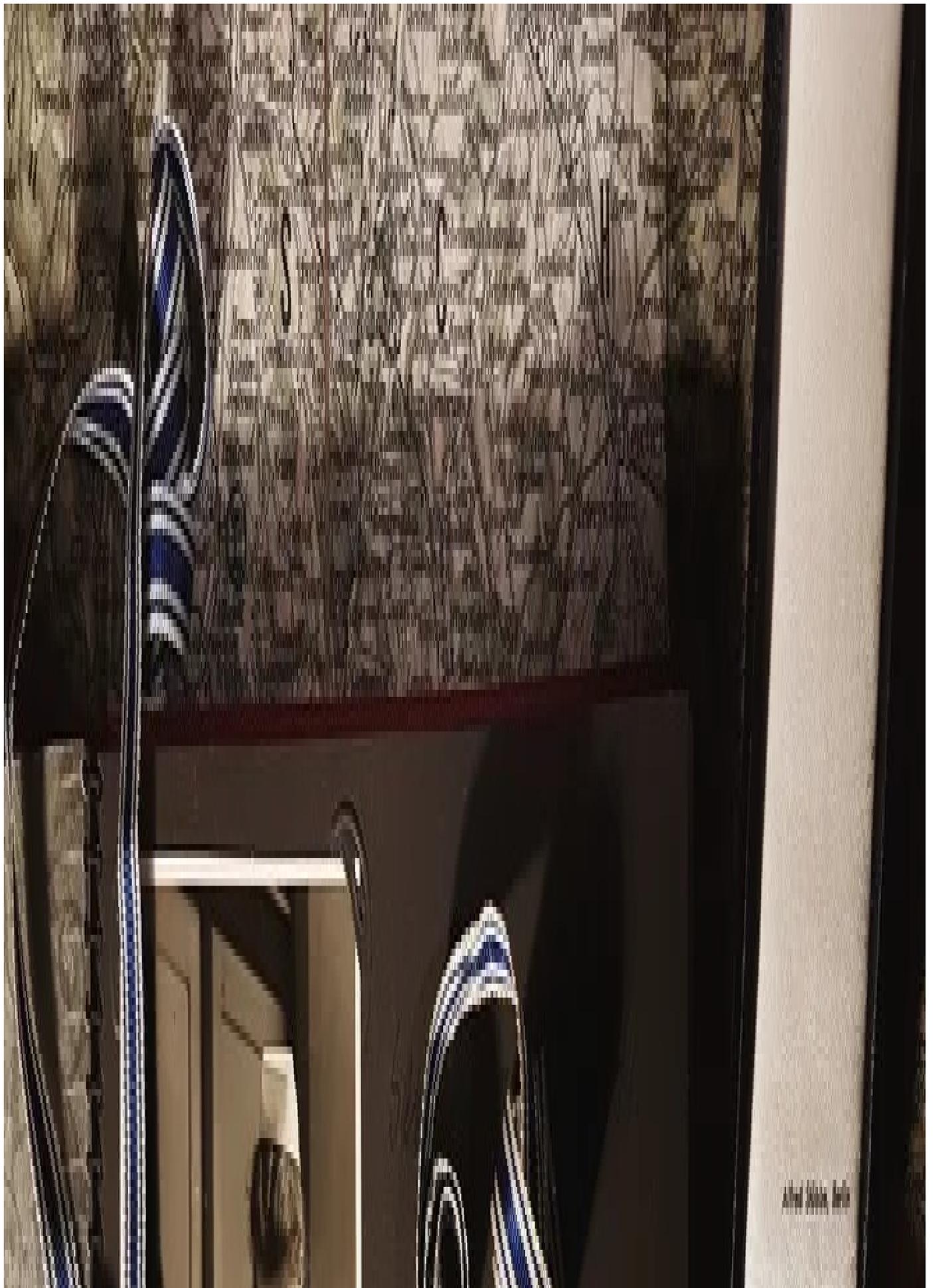
希特勒曾大肆宣扬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道：“雅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保持主人的态度不变，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的盟主。”

为了给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寻找到历史根据，希姆莱利用了恩斯特·赫比格《冰盖理论》一书中“曾经有个超级人种，从太空来到地球，他们在古老的亚特兰蒂斯岛上落了户，创造了先进的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皆得益于亚特兰蒂斯”的神话故事，声称在德国可以找到亚特兰蒂斯神族的后裔，而雅利安人则是所有后裔中最优秀的，并鼓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去统治比他们更劣等的民族，而实现这个梦想，种族纯化和繁衍是关键一步。

同时，希姆莱认为德意志在不久的将来会拥有更广袤的疆土，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占领这些地方，而这些人必须是符合人种标准的战士——健康、白种、非犹太人，最好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

但首先阻碍这一“伟大梦想”实现的，却是德国国内的生育状况。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国内的生育率就一直持续下降，生育质量也呈现下降趋势，这非常不利于雅利安血统的净化和生息。

希姆莱对此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在1933年推动了反堕胎法的出台，规定德国雅利安女性堕胎非法。他多次号召德国人民提高“种族储备”，为德意志未来而生，还开出了许多诱人的好处，包括不管结婚与否，免除“纯种”女人的义务劳动以供她们安心生育，对那些生育有4个或以上更多孩子的“英雄母亲”发放结婚贷款、抚养津贴及颁发勋章等，而那些无子女的母亲会受到歧视。他更是授命他亲自领导的党卫军精英，专门挑选金发碧眼的德国妇女发生关系，以示“垂范”。希姆莱甚至以生孩子的多寡为标准来提拔党卫军成员，而纳粹元首希特勒也经常接见这些“雅利安后代”和他们的母亲。



图为德意志英雄母亲十字奖章

而更违背人道地，他为了提高帝国生育质量与雅利安血统纯化度，在 1934 年 1 月开始对 40 多万人实施绝育手术，这些人大多是穷人、精神病人、妓女、罪犯和其它种族的德国人。然而这些仍旧未满足他的疯狂，他在 1935 年第 13 届纽伦堡党代会上合推《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通过，规定只有日耳曼民族和与日耳曼同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不再是帝国公民，而是“不可接触”的“贱民”，明令严禁他们同日耳曼民族通婚。



图为纽伦堡党代会

虽然，希姆莱的这些疯狂举措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德国生育状况的颓势。但是，女性生育率却一直不见快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女性未婚先孕还没被社会普遍接受，是德国伦理社会的雷池。触犯该禁忌的德国少女往往会因此丢掉工作或逐出家门。所以对大部分德国未婚女性而言，即使希姆莱的诱饵多么肥美，她们也不愿冒险生育。

但事实上，正是人们对未婚先孕的偏见被纳粹利用，才使普通人先成为了种族试验的一部分。希姆莱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打算构建出一个为德国妇女提供秘密分娩的场所，为她们提供精心的照顾，以使她们不至中断妊娠，来稳定国家人口出生率的增长，同时为他创造所谓优等民族统治世界的理想献力。

德国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威廉·克斯特在《德国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一书对他的阴谋这样描述道：“他们（纳粹）利用社会的道德漏洞，利用为这些未婚先孕的妇女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服务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社会目的。”诚如所言，纳粹生命之泉的阴谋计划隐蔽而黑暗。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 年 12 月 12 日，德国，慕尼黑，一个以党卫队和帝国政府为注册背景，由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管理，以慕尼黑为总部，以实践纳粹种族优生学为目标的机构应运而生。希姆莱怀揣着“美好的希望”，替它美名为“Lebensborn”，即生命之泉。

生命之泉，罪恶始流

1936 年 9 月 13 日，希姆莱主持召开纳粹高级军官秘密会议，就生命之泉职责事项发表陈词，他指出：

“生命之泉由我个人指导，属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负责协助党卫队领导者筛选合格的孩子并安排收养……对纳粹机构的所有领导而言，成为生命之泉一员是光荣的职责。”

希姆莱就确定生命之泉职责的会议陈词标志着该计划第一阶段正式在德国本土展开，其主要任务是为德国女性提供秘密分娩的场所和召集符合条件的雅利安女性与“优秀纳粹党士官”结合繁育“雅利安超级婴儿”。

德国境内的生命之泉家园，或更贴切地说——“生育农场”，始终由党卫军人严密防守，处在严密的管控状态，并配备完善的医疗和生育检查体系，以保障这些金发碧眼的美丽少女们的安全。但这些舒适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她们在这里悠闲地等待分娩或谈恋爱，而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纯种雅利安人，即“只为生产，不谈感情”，是一个纯粹的工厂化机构。



图为狂热的德国少女联盟

在生命之泉家园的雅利安少女，既有迫于社会压力“逃难”于此的未婚先孕的少女，也有一些选择在这里进行分娩，以此标榜她们血统纯洁性的纳粹高级官员的妻子。当然，在这里的更多是主动寻求与“优秀纳粹党士官”结合的雅利安少女，她们中有些是主动响应号召来到家园的德国少女联盟的激进分子，也有些是妓女或穷困和绝望所迫的妇女，希望能获得些许补贴以养家糊口。

这些妈妈往往“被照顾得像公主一样”，食物精美，衣着华丽。在分娩之后还会得到政府给她们发放的结婚贷款、抚养津贴以及颁发的德意志母亲十字勋章等。由于她们中大多是未婚先孕，当局还会破例同意她们匿名，而她们的孩子也不会官方文件上登记，但恰恰是因为这点让许多孩子在以后变得没有“出处”。不仅如此，生命之泉还保证，如果孩子出生后不想带回家，就可以把他们留在营地，接受最好的教育，然后被送到支持纳粹的上流阶层家庭抚养长大。这些“诱人的条件”让很多德国女性趋之若鹜。

在被选中的女性怀孕生下孩子后，还要被带去参加一个类似宗教仪式的党卫军命名仪式——带有党卫军标志的匕首举过孩子的头顶，同时妈妈们宣誓效忠纳粹。这也正是战后欧洲民众仇视这些少女，称她们为“纳粹妓女”或“德国妓女”的原因，而她们生下的孩子也顺之被称作“希特勒婴儿”或“纳粹杂种”。

当然，在这里秘密分娩出的大多数孩子也都会得到精心的照顾。但那些在家园“生产制造”出的有“瑕疵”的孩子结局则是非常悲惨的，他们通常被“生育农场”中的护士带到安乐死诊室进行处理，要么饿死，要么被注射毒药。而那些健康的“生产出的孩子”除了少部分由愿意接受的亲生母亲抚养外，大多数都被送往当地的育婴院，稍大一点后被家境富裕的纳粹分子收养，按照纳粹的标准被抚养，让他们成为更加优质的纳粹士兵。



图为对生命之泉计划孩子的洗脑同化

自1936年底第一座生命之泉家园在德国巴伐利亚建成后，希姆莱又先后在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9所生命之泉家园。从后世公开的档案与历史学家的推算得知，在德国的10个生命之泉家园中大约“生产”出了8000—10000个“希特勒婴儿”。

理想状态下，纳粹党卫队军官应与纯种的雅利安少女结合生育。但因军官人数的限制，加之希姆莱不可能去鼓励已婚之夫出轨，所以希姆莱决定开展计划的第二阶段，将计划的重任托付给大批的德国士兵。因此，自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后，纳粹德国相继占领了波兰（西）、丹麦、挪威、比利时等周边国家后，便开始大肆鼓励德军士兵与当地金发碧眼的女性结合，“生产”孩子，并在这些被占领国秘密建立了生命之泉家园。

历史学家马克·希尔说道：“当年在生命之泉花园分娩过的德国女子都将她们的行为当作是爱国心的表现，为的是生产出金发碧眼的新一代纳粹分子。不过，对于其他纳粹占领国的女性，‘爱国宣传’显然毫无作用，于是纳粹便使用一些更残忍的手段，逼迫金发碧眼的当地女子与德国士兵发生性关系。”

其中，在被占领国中，挪威人非常接近纳粹雅利安人种的标准，都是金发碧眼。因此希姆莱大力鼓励德国人和挪威人进行混合“生产”孩子。挪威也成为纳粹实施这一计划的核心地区之一。在那里，纳粹建立了9个生命之泉家园。二战时期，由于挪威作为德国北方门户的重要战略性，德国在挪威的占领军比起其他地方要多得多。当时，挪威有300万人口，但却有40万德军驻扎在那里。德国人和挪威人结合的例子非常多，即便在德军撤离之后，生命之源家园还存活了一段时间。根据挪威当局资料，德国占领挪威期间，在那里留下了大约1.2万名孩子，他们的父亲绝大多数是当时驻扎在挪威的德国士兵，其中有约8000人来自于设立在挪威的生命之源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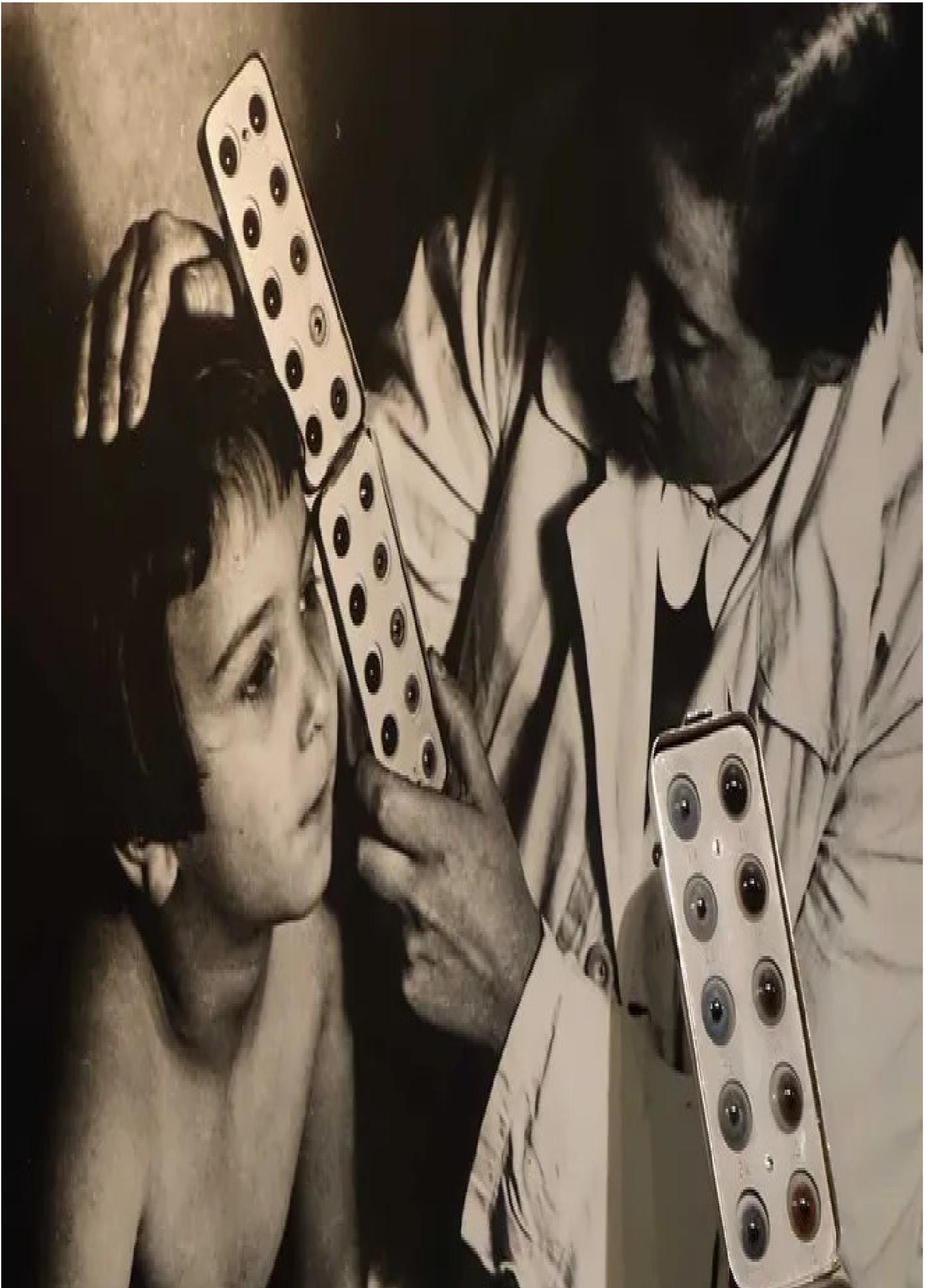
图为挪威少女与一名德国士兵西坠入爱河

不仅如此，这些在被侵占的欧洲各国建立的“生育农场”或“生命之泉家园”数量十分惊人，其中挪威9个，波兰8个，奥地利3个，丹麦2个，法国1个，比利时1个，荷兰和卢森堡各1个，共计26个。这些在被侵占国建立的生命之泉家园虽然看似很豪华，但实际上大多数孩子都是被当作贵重产品严加看护，只有最优秀的孩子才能玩一会儿玩具，也有孩子可能因为长不成雅利安模样就此消失，总而言之，根本没有什么雅利安基因，不过就是给北欧长相的人取的名字，在它们看来，只要金发碧眼就好。

但纳粹始终觉得十月怀胎批量生产“雅利安婴儿”的速度跟不上他们的野心，于是干脆就直接绑架其他国家具有雅利安血统和相貌特点的金发碧眼的儿童，将他们送到德国给党卫队成员抚养，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德国的“铁军”。这也是生命之泉计划的第三阶段，也是更为人憎恶的行为——绑架、分离。

这一更为罪恶的行为始于1942年。1942年，当德国坦克开入克里米亚时，纳粹官员一眼就注意到了在—群“劣质斯拉夫人”的海洋中，竟有一个“天使般的雅利安男孩”。他们当机立断，从母亲怀里毫不

费力地把他抢走。在他们眼里，这无疑是一场拯救行动，因为让一个“完美的孩子”在不良环境中长大，简直与犯罪无异。所有可爱的孩子，都必须属于德国。随后，他和其他被抢来的孩子一样，被送到了医学检查部门。



图为对孩童进行医学检查

在那里，医生为每个孩子做了详细的测量，胎记、发色和眼睛的颜色也经过了“人类学辨别”。简单几项身体数据最终构成了命运的判决——“最佳”、“可接受”或“劣质”。前两等会被送回德国“生命之泉”，而最后一等，则会登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然而，身体达标只是第一步，到了德国，迎接幸存儿童的还有社会化改造。没人会对这些背井离乡的孩子稍作抚慰，相反，他们被禁止说本国语言，只能学习德语。有护士说服孩子，他们是故意被父母遗弃的。一旦“德国化”成功，孩子会被忠实于纳粹的富裕家庭收养。而剩下不成功的孩子，还是只有集中营一种选择。

据统计，当年纳粹在各国抢夺的孩子远远超过 25 万人，而活下来的，只有一小部分。

文件显示，在波兰等地，纳粹党卫军一边给父母拍照，一边在大街上将他们的金发孩子抓走送给德国家庭收养。但由于战争后期德国资源缺乏，许多被绑架儿童都因营养不良而死去。

二战结束后，尽管纳粹“生育农场”计划主要负责人、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服毒自杀，但他负责制定的纳粹“生育农场”计划档案却在炮火中幸存了下来。档案显示，纳粹计划在被侵占的欧洲各国都建立“生育农场”，虽然二战中有 600 万德军士兵死于战争，但希特勒却显然希望通过“生育农场”计划炮制出更多的士兵。希特勒对英国金发女郎和孩童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计划一旦德军攻克英国，就立即命令希姆莱在英国各地建立多处“生育农场”，逼迫成千上万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人跟德国军官发生性关系，炮制纯种的“雅利安后代”。

但幸运的是，随着纳粹的灭亡，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泉计划”也寿终正寝，众多金发碧眼的欧洲女人和儿童都逃过了这一大劫。至于在生命之泉家园到底有多少孩子出生目前也并没有详细数据。但我们所知道的是纳粹德国这一罪恶的种族计划，给欧洲数以万计的家庭和儿童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从德意志之光到纳粹的猪猡

1945 年 5 月 8 日，德意志第三帝国投降，纳粹荒唐的人种繁殖计划也随即宣告破产。但纳粹创造“优等种族”的罪恶行径，却使数以万计的孩子成为牺牲品。这些当年在“育婴农场”诞生的儿童在长大后都因为“具有纳粹基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与社会的欺凌。哪怕是在战争结束后多年，纳粹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章依旧是他们身上永远擦不去的耻辱的标记。

无尽的烦恼和耻辱，这就是当年这些曾经被认为要继整个地球的“优秀人种”从纳粹那里、从希特勒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对他们来说，历史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锦衣玉食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二战就结束了。这些曾经具有特殊地位的妇女和孩子不得不面对他们从纳粹蹂躏下解放出来的同胞。因对纳粹迫害的恐惧和对纳粹罪行的憎恶，同胞们总是迁怒或转移伤痛于这些可怜的“杂种”和“妓女”。这些曾被视为“德意志之光”的孩子和“英雄母亲”的年轻女性转眼间便跌落到身为“纳粹的猪猡”和“纳粹妓女”的地狱。



图为战后“通德”女性的凄惨下场

而命运最悲惨的恐怕要属出生在挪威的“希特勒婴儿”了。纳粹虽然鄙视犹太人血统，却对挪威人的北欧血统十分赏识。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的时候，德国军队指挥官纷纷指使他们在挪威的部下尽量和挪威妇女“结合”。出于逼迫或出于自愿，成千上万的挪威妇女成全了他们，生下了成千上万个雅利安血统和北欧血统混合的“希特勒婴儿”。这些挪威妇女万万没有想到，赋予这些孩子以生命将来会给自己和孩子带来终身的耻辱和遗憾。

曾被当作“纳粹崽子”被关疯人院里18年的挪威人保罗·汉森回忆道：“我是作为当清洁女工的母亲和一个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一夜风流的产物，我一出生时就被母亲遗弃了。虽然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北部的一个‘育婴农场’过了三年的好日子，但战争一结束，我便因自己的血统成为一个没父母认领的‘希特勒婴儿’，惊恐未定地等待命运的安排。后来被挪威国家社会事务部门当作智残儿童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那里是最难以忘怀的地狱：弱小的身躯经常被警卫的大头皮鞋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吃住的地方在一块，粪便东一块西一块，长年没有人打扫；黑夜里经常被其他“病人”凄厉的尖叫声惊醒。”而汉森的经历不过是希特勒婴儿们战后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

从挪威公布的官方数据得知，战时挪威大概有12000个“希特勒婴儿”出生在生命之泉家园。这些德国人的后代令挪威人害怕和憎恶，他们视这些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为未来的法西斯第五纵队。而官员也公开宣称，“要相信这些孩子会成为良好市民，就如同相信老鼠能成为家养的宠物”。迫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挪威政府把一部分孩子遣送回了德国，甚至不远万里将一部分送到澳大利亚和巴西，目的很简单，尽可能清空生命之泉家园内的“库存”。

而大部分“有一半纳粹血统”的“希特勒婴儿”大都留在了挪威，被成批成批地送到了孤儿院。白眼、嘲笑、侮辱和殴打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纳粹的猪猡”是这些儿童在社会里怎样都摆脱不了的绰号。他们也因此往往自卑、苦恼于痛苦。不仅如此，如果你收养了这些“希特勒婴儿”，邻居、居委会、学校等都会不断找你麻烦，甚至商店也会拒绝向你出售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这些孩子的母亲，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甚至还是少女。在战争结束时，有大概5000个和德国士兵有染的妇女被丢进了拘留所，“纳粹妓女1~X号”是这些女性的新名字，而许多文章和后来的不明真相者还喜欢跟风把这些女子称作叛国者或德国妓女进行报道宣传。

的确，有些女人会因为德国士兵会给她们带来更好的食物，送她们贵重的礼物，带她们去聚会而选择与他们交往，她们中既有妓女也有向纳粹告密叛变国家的人。但是很多年轻女人只是简单地恋爱了而已，她们有的年龄甚至才16岁。要知道，在被占领时期，有超过350000德国士兵住在挪威——挪威当时也就只有300万人而已，且大多数德国士兵都住在平民家里，而他们大部分都还是少年，更确切地说是还未脱稚的大男孩。要知道，处在热恋期的少女和少男是很难控制住自己爱上彼此的，而一旦相爱总会有“结果”的。

但当1945年德国占领结束后，很多这样的女人却都被当作了叛徒游街示众——事实上，这样的叛徒只是极少数。当地的暴民们减掉她们的头发，还让她们丢了工作。虽说有个德国男朋友并不犯法，但是对于很多挪威人来说，这仍被视作是一种背叛。纳粹意识形态在占领时期愈演愈烈，而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也在高涨。当挪威解放后，所有和德国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作异端。恐惧、仇恨、偏见，已然成为对“纳粹遗产”的基本态度。

所以，很多母亲都极力隐瞒自己有个德国血统小孩的事实。其他人觉得简直不能把他们的孩子留下来。要是被人知道你是个“德国妓女”，不要说找工作，想要平平稳稳的生活都很艰难——你的邻居们不会让你忘记这一点的。

不仅是挪威，在战后，法国、波兰、奥地利等地同样掀起了一场惩戒“德奸”女子的风暴，人们把这些女性抓到街上，剃光头发，更有甚者还会脱光衣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游街示众。有些女性甚至被送到了秘密监狱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些妇女和儿童大都有难以愈合的心理伤痕，挪威最大的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就曾说过：“这些妇女绝大部分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失常，已经长大成人的“希特勒婴儿”有80%以上智力发育程度低于同龄人。”

很多人借此发挥，说德国士兵是弱智，那些和他们结合的挪威女人也是弱智，难怪他们觉得生这些希特勒婴儿们也带着弱智的基因。讽刺的是这样想的人和纳粹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现在把纳粹基因从强换成了弱，但是思想一样都是反人类和漏洞百出。

对于德国“希特勒婴儿”而言，可能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处境或许似乎会好些。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处境依然艰难。前文提到过，这些孩子大多由党卫队家庭抚养长大。但是随着二战德国的失败，德国被分区占领，由苏联和美英等国实行战后改造，清除纳粹残余成分，这些家庭也因此大多破产或受到“正义的审判”。既然，自己也难顾自身，对于这些非血缘关系的孩子而言则难逃更悲惨的命运。不仅如此，在二战后期德国粮少食缺的国情下，这些没有出处的孩子却享受着国家的优厚补助，很难不受到来自周边人的嫉妒和憎恶，也因此他们大多战后被受到欺凌和歧视。

除了本身生活的悲凉外，这些孩子还有沉重的负罪感。这和挪威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在挪威许多孩子的父亲仅仅是士兵。而德国很多孩子的父亲是党卫军首领，他们是战犯，这些孩子作为战犯的产物，在德国本土有着更强的负罪感。

在纳粹高级军官抚养和教导下长大的黑尔格·卡罗深有此感，他说道：“住所不远就是犹太人屠杀区，有4年的时光，我是在纳粹高级军官的抚养和教导下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实际上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此外烦扰“希特勒婴儿”的还有他们谜一样的身世。他们中有人曾经试图找到自己出身的答案，却往往因人们长期以来不愿面对历史、不愿和纳粹不光彩历史沾边而受挫；他们的亲身父母或养父母对“生命之源”计划都三缄其口，而二战即将结束时，党卫军紧急销毁的“生命之源”相关文件更是使解开这些人的身世之谜难上加难。

生命痕迹，跨越世纪的斗争

事实上，许多曾经为“生命之源”工作的女人，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在余生中都耻于提起“生命之源”、不愿接受自己这段人生轨迹。因为不管她们的作用是多么微小，她们都曾经扮演着支持希特勒种族政策的角色。

吉塞拉表示：“说出真相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纳粹统治下，她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罪恶、耻辱和恐惧。于是她们建造了一座谎言之墙，然后有人出现，威胁说要推倒这堵墙。这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威胁她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愿意道出真相的原因。当时，许多女人向党卫军立下誓言‘忠诚是我的荣幸’，这句话至今仍影响着她们的生命。她们情愿死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不仅如此，政府也希望掩埋掉这段历史，不仅是像德国一类希望隐藏掉自己罪恶行径的纳粹国家，也包括像挪威一样不愿回顾这段历史的受害国家。他们往往采取间接干涉或封锁档案的方式来阻拦真相的揭露。如此总总，仿佛构成了一座巨墙，将这段应被世人铭记的历史阻隔在真相的光芒下。

现已过世的希特勒婴儿汉斯·乌尔里奇·韦斯奇回忆道：“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总是极力阻止希特勒婴儿们寻找亲生父母。我曾经写信到韦尼格罗德的登记处，但他们没有回信，反而把我带到了‘斯塔西’面前。‘斯塔西’想知道我为什么调查这种事情、我认为自己是谁。他们还告诉我当年的那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那是个法西斯组织，而且所有的文件都已被摧毁。‘斯塔西’还坚称即使韦斯奇的父母还在世，他们也已经再婚，不会想与他有任何联系。”

直到1999年12月，德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德国政府档案的故纸堆中发现了1000多份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有关“育婴农场”的资料——对于出生此地的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藉此，成千上万当年的“希特勒婴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这是近50年来发掘生命之泉计划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进展。之后，挪威民间团体成立了一个名为“挪威生命之源战争儿童联盟”的组织。该组织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占领期间出生、父亲是德国人的人群，这一人群往往遭到政府不公正对待而要求政府进行赔偿，该组织会为他们提供援助。这也标志着关于生命之泉历史发掘行动由个人斗争向组织行动转变。

2006年11月4日，德国东部城镇韦尼格罗德见证了一次特别聚会，约40名参与者都是德国纳粹秘密计划的受害者。他们被称为“希特勒婴儿”，是当年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净化、制造“雅利安超人”秘密计划的产物。这是“希特勒婴儿”首次公开聚会。如今都已年过六旬的“希特勒婴儿”们在聚会中公开讲述各自的故事，向世人揭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图为年过六旬的希特勒婴儿聚会交谈

此前，由于许多“希特勒婴儿”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或父亲就是党卫军成员，他们有很强的负罪感，许多人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希特勒婴儿”们在2002年才开始首次私下聚会，2003年才正式成立了“生命痕迹”组织。约60名组织成员中，大部分都是“希特勒婴儿”。该组织负责人马蒂亚斯·麦斯纳表示：“直到今天，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在遭受这个秘密和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的痛苦折磨。”

“生命痕迹”举办这次公开聚会，鼓励“希特勒婴儿”正视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互相鼓励支持，并分享寻找亲人的经验。组织成员维奥莱特·瓦伦博恩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鼓起勇气公开身份，讲述我们的故事。”

现年63岁的吉塞拉·海登赖希也参加了11月4日的“希特勒婴儿”集会，她是首个出书讲述个人经历的“希特勒婴儿”，在书中她勇敢地告诉世人自己如何寻找真相。吉塞拉的自传还被改编成电影，并在2006年7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播放。

她曾两次回到以前母亲工作的巴伐利亚育婴农场斯特恩霍灵——它坐落在绵延起伏的旷野上，远处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吉塞拉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负责“希特勒婴儿”领养登记工作。如今，这所被废弃的房子靠马房而立，房屋大门上的纳粹党卫军标志依然清晰可见。门前的纳粹雕像——“希特勒婴儿妈妈”用母乳喂养孩子，提醒并向世人诉说着这里曾经破碎的历史。

她还公开强调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生命之源”这段历史故事的重要性：“如今孩子们知道很多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他们对历史缺乏情感上的联系”吉塞拉说：“‘生命之泉’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是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故事。这能帮助学生们把历史和自己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历史。”

尽管斯特恩霍灵现在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中心，但吉塞拉依然深有感触。她说：“看着这些快乐的孩子玩秋千，真的非常激动。如果生活在当年那个第三帝国世界，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希特勒疯狂的种族政策不允许。”吉塞拉说她在“生命之泉”纪录文件里找到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计划下出生的残疾儿童不是被杀死就是被送去集中营。

所幸的是生命之泉计划随着希特勒的死去连同着它依赖的第三帝国一同灭亡。这是一段段黑暗压抑的历史，总是让人清楚直白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人性的阴暗。但愿历史上的这场悲剧不再重演，但愿人类文明史上这段最黑暗的岁月成为永远过去。

·作者寄语：

“说实话，我认为我写作的与其说是一篇学术性史论，倒不如说是一篇探讨人性的文章。关于生命之泉题材的论文、电影、游戏等，我之前都接触过，它们总是给我很压抑的感觉，让我反思着人性。这也正是我作这篇文章的动因。我希望人们能更好了解战争的残酷、了解这些破碎的童年、反思人性光辉的问题。”

·附注：

①、“你在街上拦住任何一个村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生育农场的事，我想他一定会露出迷惑的表情。事实上，我们这儿的居民倒是知道很多用种马繁殖马驹的事，但这仅仅限于农场马匹而已！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我们附近居然有过用来繁殖所谓纯种人的生育农场！”

——拉莫拉耶当地居民路茜妮·让

②、“我们被照顾得像个公主一样，到现在我还在想为什么纳粹可以如此狡诈地实施他们罪恶的计划”
——《棱镜》，自一位曾在生命之泉花园生过孩子的妇女

③、“那时总有异样的感觉，就像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根！”

——“希特勒婴儿”健在者，弗尔克·海尼克

④、“就像一些回忆拼凑起来的画面，却直愣愣地往心窝里戳！”

——电影《生命之源》（2000）影评

⑤、“正视历史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曾经遭受摧残，所以痛恨任何和施暴者相关的东西，哪怕这样的迁怒毫无道理可言，战争带给人们无尽的伤痛，而他们又将这些伤痛转嫁在无辜孩童身上。”

——游戏《我的孩子：生命之泉》玩家评论

创作不易，请多支持，未经作者授权，禁止转载！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1804606>